



中國古史的 傳說時代



(增訂本)

徐旭生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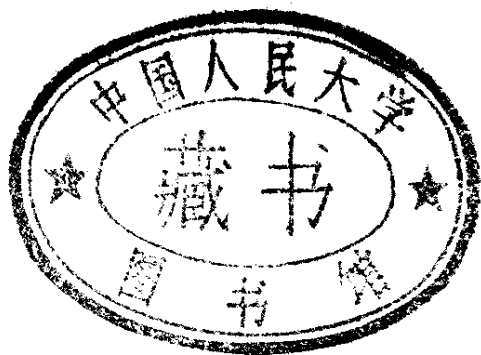
文物出版社



中國古史的 傳說時代

•
(增訂本)

•
徐旭生 著



文物出版社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徐旭生 著

*

文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大兴县风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 1/32开 印张 10.25 插页 1

1985年 10月 新一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68·1327 定价:1.60元



徐旭生先生遺像

出版说明

本书是已故的徐旭生先生研究我国史前时期古史的著作。本书初版于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结合考古调查作者对本书作了较大的增订，1961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增订新版。其后即未再重印。由于作者研究古史传说并不仅据文献，故成就也超过前人，他的研究成果至今仍然可供研究史前学的学者参考。应读者需要，我们商得原出版者和作者家属的同意，改由我社出版。

这次重印，由徐先生的学生黄石林同志写了序言，我们改正了一些原版的误字，书前加印了作者照像和作者小传及主要著译目录，以纪念作者几十年来学术活动的贡献。

2016/10/4

徐旭生先生传略

黄石林

徐旭生先生，汉族，原名炳昶，后来以字行，笔名虚生、遯庵。1888年12月10日（清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八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桐河镇砚河村，1976年1月4日病逝于北京，终年八十八岁。

先生以毕生精力从事中国古史传说的研究以及夏文化的探索，在国内史学界享有声誉，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古史学家、考古学家、教育家。

先生生长于书香门第。父亲徐纲，前清秀才，选任为河阴县（在郑州西，现属荥阳县）教官，为人正派而又具有较高文化素养。1892年春，先生四岁时随父母至河阴，开始识字。1894年发蒙，开始读《通鉴纲目》、四书、五经等书，并能背诵。他从小受到古文化的熏陶，青年时代，就对中国古史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为他后来进行古史和思想史研究打下了基础。

1906年，先生来北京肄业于豫学堂。是年冬，考入译学馆学法文，于1911年毕业。

1912年，在彰德中学教算学和法文。数月后，考取公费留学法国。

1913年春至1919年春，在巴黎大学学哲学。在此期间，开始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对人类有着重大意义，并恍惚地预料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将成为世界不可抗拒的潮流。”留学巴黎，不仅给他增添了新的知识和新的政治经验；而且第一次听到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使他的视野更加宽阔。他在思想上受到进步影响。

1919年夏天回国后，在开封第一师范学校及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教课。

1920年秋，河南教育界反对军阀赵倜，举先生为代表，赴北京请愿。此后先生即留居北京。

1921年起，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讲授西洋哲学史，翻译了威伯尔《欧洲哲学史》。其后又与乔曾劬合译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历史长篇小说《你往何处去》，这是该书最早的中文译本。

1925年，任《猛进》主编。《猛进》是当时具有进步倾向的一种政论性的周刊。先生在《猛进》上发表过题为《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的时事短评，引起鲁迅的重视。鲁迅因而在《语丝》周刊上写了《论睁了眼看》的文章，就此进一步展开论述。此后与鲁迅建立了友谊，并经常通信评论问题。

先生曾经参加过当时的学生运动。他为争取关税自主，率领学生举行游行示威，竟被北洋军阀政府的军警打掉两颗门牙。他“留牙蓄志”，将两颗打落的门牙一直留在身边，死后才由亲属放入他的骨灰盒里。

是年5月，女师大闹学潮，学校被北洋军阀强令解散。先生与鲁迅、许寿裳等进步教授一起，亲自到北京宗帽胡同的女师大临时校舍内，为学生们义务授课，旗帜鲜明地支持学生的反抗行动。

1926年3月18日，先生激于爱国义愤，参加了北京各界人士在天安门的集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撤除大沽口国防设备”等无理要求，并强烈要求段祺瑞政府拒绝八国通牒。会后游行，段政府的军警却向游行示威者开枪，当场死伤二百余人。先生未参加游行，但闻讯后，当晚独自一人手提马灯去铁狮子胡同看望受伤学生，表示慰问；随后又向死难烈士遗体告别，以示哀悼。段政府竟把李大钊、鲁迅和先生等四十八人列上黑名单，下

令通缉（见鲁迅《而已集·大衍发微》）。先生为维护祖国的独立自主，为支持学生的进步运动而奋身斗争，表现了一位爱国者的崇高的正义精神。

是年秋，任北京大学教务长。

1927年，中国学术团体协会鉴于当权者对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无知和偏见，不惟不奖励科学，并且阻碍研究，于是提议组织起来，到各地搜集材料，以为精深研究提供条件；对于外国人，愿与协会真诚合作者表示欢迎，对于那些企图进行文化侵略，攫夺科学材料的人，则予以拒绝，不使再溷吾土。抱着这种宗旨，经过一番斗争，才与瑞典斯文赫定合作，组成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先生任该团中方团长，在我国西北地区进行科学考察。先生写有《徐旭生西游日记》一书，详细地叙述了该团工作情况和当时当地的一些民情风俗以及古城与恐龙化石的发现。

1929年12月，任国立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院长。对学校作了一番整顿，筹办了研究所，出版《女师大学术季刊》，开展学术研究，在文史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

1931年2月，北平师范大学与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合组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先生任合组后的北师大校长。

是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北师大师生热烈地投入抗日斗争。事变后两天，先生即会同北大校长蒋梦麟，并邀集北平各大学校长，举行紧急会议。同日，又召集本校院长、教务长等，开紧急会议，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年11月，亲赴南京，请求增加北师大经费，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拒不接见，先生愤而辞去北师大校长职务。

1932年，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编辑，后改为研究员。

1933年，前往西安，与当地文化人士合组陕西考古会。这是西北地区首次建立的考古机构，对西北地区考古工作的开展，起了促进作用。此后数年间一直主持宝鸡斗鸡台遗址的发掘工作，开始注重周秦前期文化的研究。又在渭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写

有《陕西渭河附近考古调查报告》与《陕西最近发见之新石器时代遗址》两篇报告。

1937年初，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改为史学研究所，先生任所长。北平解放后，又任北平研究院代副院长。这期间先生遂专心研究古史传说，撰写《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对殷代盘庚以前的古史作了综合整理。又写有《中西文化的试探》一书，惜未印行。

建国以后，先生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当选为河南第一、二、三届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7年，先生以七旬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更加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对自己的要求更为严格。

1959年，先生首先提出探索夏文化问题，并亲自作实地调查。他不顾年迈体衰，前往河南登封、禹县、偃师一带进行田野调查，一日步行四十余里。当时正值春夏之交，有一日，正遇大雨，劝他坐大车，不听，坚持脱鞋光脚在泥泞中步行，走了五、六里路才至住所。次日仍继续工作。先生时年七十二岁。这种历经辛苦，为科学事业献身的雄心，老而弥笃，感人至深。

1962年11月，湖南举行纪念王船山逝世二百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先生被邀参加。王船山是他最推崇的学者之一，在思想上也深受其影响。在会上，他发表了引人重视的意见。他说：船山超过了朱熹，他把张载的思想发扬光大。船山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论思想，决非《老子》和《易经》所能比拟。船山有很多光辉命题，特别是强调“与天争胜”，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思想，这在古代中国与西方均无人超过他。船山十分注重研究自然，强调亲眼所见，“耳闻不如目见”。先生也总是强调亲自实践，实地调查的重要，是船山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我曾陪同他前往庐山、井冈山和衡山，并西去敦煌千佛洞等处考察。这些实地考察，不仅加深了他对祖国河山的热爱，在思想境界上也愈益宽广。

“十年内乱”中，先生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身心受到

摧残。但他大义凛然，在原则问题上绝不低头，不愧是一位刚正不阿的坚强老战士。

先生在学术上卓有成就，尤其是对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颇多真知灼见。他以充实的材料写成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时隔四十年，仍是中国第一本最系统地研究古史传说的重要著作。这本书，凝结着他多年研究古史传说的心得，蕴含着独到的学术见解。他认为：

中国古代部族的分野，大致可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

华夏集团，地处古代中国的西北方。再可细分为三个亚集团：1.黄帝、炎帝两大支；2.近东方的，又有混合华夏、东夷两集团文化，自成单位的高阳氏（帝颛顼）、有虞氏（帝舜）、商人；3.接近南方的，又有出自北方的华夏集团，一部份深入南方，与苗蛮集团发生极深关系的祝融等族。

黄帝族的发祥地，在今陕西黄土原上，畔姬水，得姬姓。炎帝族则在今陕西境内渭河上游，畔姜水，得姜姓。此后，两族中各有一部份渐向东移。炎帝族顺着渭水、黄河两岸，一直发展到今河南及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界的地域。黄帝族顺着北洛水、渭水及黄河北岸，随着中条山、太行山脉，直到今北京附近。

东夷集团，太皞、少皞、蚩尤均属之。它的地域范围：北自山东的东北部，最盛时达山东北部全境。西至河南东部，西南至河南极南部。南至安徽中部。东至海。

苗蛮集团，三苗、伏羲、女娲、驩兜均属之。它的地域应以湖北、湖南、江西等地为中心。迤北到河南西部熊耳、外方、伏牛诸山脉间。

这三大集团互相斗争，后又和平共处，终结完全同化，渐次形成后来的汉族。

他又认为，在中国古史上有三大变化：

一、华夏族与东夷族渐次同化。从前部落林立的中国渐次合

并，形成若干大部落联盟。

二、黄帝死后，高阳氏（综合华夏、东夷两集团文化的部族）出现。生产力有所发展，贫富分化，劳心与劳力分工。这样的分工，在当日表现为原始宗教内部的变革，帝颛顼的“绝地天通”，就是这宗教改革的具体内容。这时，文明的曙光已经在望。

三、大禹治水后，氏族制度逐渐解体，变成了有定型、有组织的王国。

先生的这些论述，为我国古代传说时代的研究，创立了一个新体系。

在探索夏文化问题上，先生尽了推进之力，立下开创之功。他在《略谈研究夏文化问题》一文中，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指出夏文化这个词包括着两种涵义：一是指夏代文化，二是指夏族文化。如果指前者，那它的地域范围较广，而时间则起自禹，终于桀。如果指后者，那它的地域范围很有限，而时间还应包括禹以前，桀以后。夏族所具有的文化，都应称作夏文化。中原地区有两个地域与夏的关系特别密切，一是豫西地区伊、洛、颍水流域，二是晋南地区汾、浍、涑水流域。分清概念，明确途径，这对夏文化的探索，是很可贵的。

为了弥补考古学上夏文化这一大空白点，他亲自到豫西传说的“夏墟”实地踏察，调查了几处比较重要的遗址：告成、石羊关、阎砦、谷水河、二里头遗址等，写成了《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尔后，二里头、告成与晋南东下冯遗址的发掘，就是在先生《报告》的启示下开始的。

对传说时代的研究与传说材料的整理方面，先生也有精辟的见解。他在与苏秉琦先生合著的《试论传说材料的整理与传说时代的研究》一文中指出：传说时代的研究，主要应靠传说材料。判断传说材料的价值，要解决一个先决问题，这就是要从它的本质与来源分为两类：

一、“原生的”，包括一切见于早期记载的传闻异说。

二、“再生的”，包括一切见于后期记载之假的、伪托的、孳生的传说故事。这种传说大部发生在东汉以后。其中却非全无“原生的”传说。

归结一点，就是注重史料的原始性、等次性。按照材料的内容与写定的先后，大概可分为三期。

第一期 包括商周到战国前期的作品。如甲骨文、金文及《尚书》、《周易》、《诗经》、《论语》、《左传》、《国语》等书。

第二期 包括战国后期到西汉末的作品。如先秦诸子、《周书》、《山海经》、《国策》、《大戴礼》、《史记》、《淮南子》等著述。

第三期 东汉以后作品。如譙周、皇甫谧、郦道元诸人书中保存的一部分古代原始的民间传说，可补前人著述的不足。

对于传说故事，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要在研究中鉴别真实的历史成份，由可靠的线索中理解史事的真象。先生这种具体分析、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对于指导我们研究学问是非常有用的。

先生还对我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原因及井田制等历史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

在《对我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问题的看法》一文中提出，重农抑商或作重本轻末，在秦汉以后至清末海通，不但成为制度，并且学说繁多。这种学说，对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只能起抑制作用，不能起推进作用。秦汉以来，还建立了土地自由买卖制、儒学独尊制、隋唐以来的诗赋取士制、明清两朝的八股取士制等等。这些都是我国特有的。还有遗产均分（不由长子一人继承）制。这些小制度对封建制度帮助很大，使它巩固而有力。

关于井田制问题，发表了《井田新解并论周朝前期士农不分的含义》一文。

他认为，井田制是孟子为滕国设计的经界方法。孟子并没有说这是三代或周代的通用法式。通览历史可以得出一条公例，就是：凡设计的制度必有所本。否则，设计的人就无法设想。另一方面是凡设计的制度对于它所本的制度必有所损益。否则，即为恢复或抄袭，不成其为新设计了。历史通例如是，孟子又何能例外？谈到井田历史的，只有《孟子》一书，有关系的仅有两句。一句在梁惠王下篇说：“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另一句在“方里而井”同章的前面，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其实，它不过是西周及春秋初期在鲁国一国内所用的不同的田制而已。孟子本是鲁人，虽未亲见而传闻所及，所以在滕国称述。

先生对上述历史问题提出的见解，均有新意。

在翻译工作上，他认为，首先“要求精确，这是科学家应有的态度”。“我开始译此书（指《欧洲哲学史》）的时候，即认忠实为最重要的目的”。而在翻译过程中，又必须时时参考原文。他又说：“想研究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必须知道他那些主要观念的原文与他用词的关系及其所受底变化各种，才可以更明白他那些思想如何发展。”“无论怎么样精确的历史书，必须问它史料的来源，必须时时参考原文，那实在是一个研究学问的人所万不能不遵守底步骤”。译辞精确，而后文雅顺达。

先生生前曾计划编出《中国古史传说资料汇编》一书，未能完成，殊为遗憾。

先生的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是一位渊博的学者。他的为人，正派、耿直、真诚、朴素，处处都是我们的表率。他那慈祥和蔼的学者风度，为学术研究而辛勤努力，工作上认真负责，治学上严谨求实，堪称一代师表，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序

徐旭生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古史专家，考古学家。

徐老早在半个世纪前，以长达三十年的持续研究，写成《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这本书，是对中国上古史进行综合性研究的专著。

这本书，凝聚着徐老的心力，蕴含着他的独到的学术见解。

一、中国上古的历史，按司马迁《史记》，从黄帝时起，开始揭示文明时代的序幕。

黄帝，中国人文初祖。生长于姬水之滨，发祥于今陕西黄土原上。这时“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国语·鲁语》），
“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史记·五帝纪》），已进到农业生产的社会阶段。他以军事武力东征西讨，南攻北战，统占了大河中游两岸地区，建立了中原部落大联盟，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国家基础。从此，中国古代文明的曙光，由中原大地上依稀地映照四方。一个华夏文明古国，即将屹立在世界东方。

黄帝，颛顼、帝嚳、唐尧、虞舜，号称五帝。徐老指出，这个时代，生产力有较大的发展，已由量变达到质变的时代。它曾经历过三次大变革：（1）黄帝统占中原，过去部落林立的局面，经此大震荡，逐渐相互融合与同化，形成部落大联盟。此一大变也；（2）颛顼时，“绝地天通”，大胆改革，人神分开，有人专管社会秩序方面的事，又有人专管宗教方面的事。劳心者与劳力者日益分化，氏族社会解体，特权阶级产生。此二大变也；（3）大禹治水，主名山川。人民得能“降丘宅土”，休养生息。生

产发展，贫富不均。此三大变也。经此巨变之后，奠定了我民族的生活基础，孕育出伟大的华夏民族，建立了有定型、有组织的王国。从这里，可以探求中国古代文化的渊源。

二、科学研究，贵在创新。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创新。当时，极端疑古派学者否定殷墟以前漫长时代的历史。对传说资料视若“腐朽”之物，或加偏见，或不引用。徐老却能“化腐朽为神奇”，力图“矫正他们错疑所不应疑的偏向，使治此段历史的方法可以早入正轨”，使夏及其以前的历史，还其本来面目。他采用古代传说，经过审慎研究与考证，从中得出一个新论断。这就是：古代中国部族的分野，大致可分为华夏、东夷与苗蛮三大集团。华夏族地处黄河中游两岸中原地区；东夷族地处山东、安徽境内及其东部沿海地区；苗蛮族地处长江中游两岸的两湖及江西地区。三大族不断接触，始而相斗，继而相安，血统与文化逐渐交互错杂，终于同化，形成一种融合而较高的民族文化——华夏文化。证之考古学上，仰韶、大汶口与屈家岭文化的分布、交流与融合的情况，大致是近似的。徐老的论述，为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创立了一个新体系。

三、徐老首先提出探索夏文化问题，不仅具有远见，同时，立下开创之功。

夏文化问题，关系到证实和补充夏代历史，关系到阶级社会的产生与中国国家形成等问题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关于夏王朝，《史记·夏本纪》已有系统的记载，但在考古学上却是一个空白点。为此，徐老极为重视，首次提出探索夏文化。并在七旬高龄之年，亲往河南洛阳、登封、偃师等豫西“夏墟”地带进行考古调查。尔后，二里头遗址、告成遗址及晋南夏县东下冯遗址就是在徐老踏察的启示下开始发掘的。

他对夏文化的探索问题，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指出：首先要明确“夏文化”一辞包括着两个涵义，即夏族文化与夏代文化。二者既有区别又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如果指前者，它的地域范围

很有限，年代则包括禹以前，桀之后；如果指后者，它的地域范围较广，年代则始于禹，终于桀。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晋南平原，汾、浍、涑水流域；洛阳平原，伊、洛、颍水流域；乃至关中平原也是夏人的旧壤。经过多年的努力，探索夏文化问题，取得了可喜成绩。山西陶寺、东下冯，河南王湾、燧李、白营、王城岗、煤山龙山文化及二里头早期文化，都是新中国考古的重要收获。也证实了徐老的卓见。

四、关于研治传说时代的古史，徐老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卓识。他认为，必须认清什么是传说时代及如何对待和处理古史传说资料，这是个首要问题。

所谓“传说时代”，徐老指出，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最初的历史，总是用“口耳相传”的方法流传下来。在古文献中保存有古代传说，而在当时尚未能用文字把它直接记录下来的史料，用这种史料所记述的时代，就叫做“传说时代”。中国的传说时代，上限尚不可定，或自炎黄时期；下限暂定在盘庚迁殷以前。

至于如何对待“传说时代”史料。徐老认为，首先应当对神话与传说认识清楚并加以区分。当然，二者之间是相近的，颇难截然分离，但也不能混为一谈。

神话，马克思说：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马、恩选集》第2卷第113页）拉法格也说过：“神话既不是骗子的谎言，也不是无谓的想象的产物。它们不如说是人类思想的朴素的和自发的形式之一。只有当我们猜中了这些神话对于原始人和它们在许多世纪以来，丧失掉了的那种意义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人类的童年。”

（《宗教与资本》第2页，王子野译）所以，神话是基于社会生活的艺术的夸张与渲染，并夹杂着空想与幻想，但也或多或少地反映着历史的影像。然而它不太可能转化为历史。

古代传说是“口耳相传”的史料。徐老认为，这些史料大都有其历史的核心，也都有其史实渊源。它是未经后人加工过的零

散资料，应比经过加工过的系统化的“正经”或“正史”中的史料更为质朴。我们应当把掺杂神话的传说与纯粹神话加以区别，也不能笼统地把古史传说全归之为神话。古书中如《尚书》、《史记·五帝纪》诸篇中或有靠不住的传说资料，那是因为古人在整理时的方法不够精密，并非古人有意作伪或造谣。

只有这样，用历史观点作具体分析，才是对待传说史料的正确态度。

在探寻史实中，徐老认为，“只敢求其可知者，不敢求其不可知者。所采用的材料，甄选西周、春秋、战国人的早期传说，不敢轻易离析这些传说”。决不能“称与我意相合者为真实，斥与己意不合者为作伪”。只有从具体材料出发，经过具体分析，才能从中引出正确结论。也只有这样论证历史，才能把论断建立在真实历史资料的牢固基础上，才可成为“不易之论”。

对于古人，对于历史，徐老认为，“非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加以深思之后，实在不应粗心浮气，乱发议论”。这确是学者所应具有的气质。

徐老的这本书，确实是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经深思之后而写出的论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值得珍视。

值此科学的春天，百花争妍。愿我们后学者学习徐老的谨严而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与勇于探索和创新的精神，沿着他开拓的新途径，在古史研究领域里去攀登新的高峰。

天 石

一九八四年九月一日于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